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丛书主编 黄 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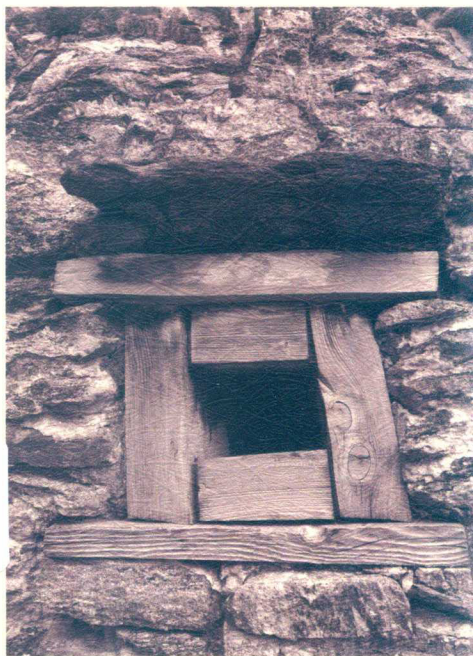
本书以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以流动电影相关的“媒介实践”作为考察对象，前后进行了五年的田野研究；在此基础上，围绕“在场”概念，从国家“在场”、观影者“在场”以及“转场”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进而从一个侧面对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 在 场

## 流动电影 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

郭建斌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为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电影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2009JJD860002）最终成果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丛书主编 黄 旦

# 在场

流动电影  
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

郭建斌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容提要

本书以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以流动电影相关的“媒介实践”作为考察对象,前后进行了五年的田野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围绕“在场”概念,从国家“在场”、观影者“在场”以及“转场”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进而从一个侧面对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民族志传播研究从方法到理论的一次系统呈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 / 郭建斌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13-21165-1

I. ①在… II. ①郭… III. ①电影放映-农村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J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0677 号

## 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

---

著 者: 郭建斌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1165-1/J

定 价: 7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9.5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 郭建斌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传播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第一篇用民族志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是国内“民族志传播研究”“媒体人类学”研究的践行者。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出版专著、参著、译著10部，发表论文（期刊论文及论文集论文）近40篇。专著《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09年9月）。

巍巍交大 百年书香  
[www.jiaodapress.com.cn](http://www.jiaodapress.com.cn)  
[bookinfo@sjtu.edu.cn](mailto:bookinfo@sjtu.edu.cn)



丛书策划 提文静  
责任编辑 靳恒春  
              提文静  
封面设计 孙  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 总序

十年之前,我们主持编辑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诸位同道的一起努力下,陆续面世,并立即激起不小的社会反响,不仅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案头之书,对于推动中国传播研究之功,亦是有目共睹。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抱着一个念头,待到恰当时机,一定要出版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著作。十年后的今天,想法变成了现实:“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终于与大家见面。

酝酿十年,一旦落定,自有诸种因缘际会,但也不完全是偶然和巧合。第一,由于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频繁,我国传播研究的视野及其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第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意识到要着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并且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近些年的学术讨论和发表的成果看,进展是明显的。第三,一批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虽然不能说就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出版这样一套文丛,显然是痴人说梦。当然,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也是推动文丛出版的一个机遇。因为这让全社会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传播对于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大影响,传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彰显,同时中国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及其新经验,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穷的活力,即此而言,“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设想,不是表示唯此独尊,而是表示不想流于一般。且今出书堪称平常,事实上每年所出之书不下成千上万,在如此花团锦簇琳琅满目的图景中,若希望这套书能独树一帜引人注目,唯有依赖质量——“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所谓代表者,无需多言,依据的自是文丛编委会的标准,也不妨说是复旦关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解和眼光。在书后所附的征稿启事中,写有这样的16个字:“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实乃此种要求的概括性表达。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者要自觉地运用理论,去发现并建构传播的问题,避免就事论事或一地鸡毛;问题是根生于中国传播的实际经验及其脉络之中,力戒凿空之论,更要防止生搬硬套概念理论。在此



基础上,研究能揭示出对人类传播具有共通性的理论意义。坦率说,这16个字,并无新鲜之处,其实也就是经验性学术研究的一般通则,但就目前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仍然有大力提倡之必要。这些年,我们复旦同仁在研究生培养和科研中一直秉承并贯彻这16字方针,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现在,将这16个字在总序中告知于众,一方面是为亮明文丛编选之宗旨,另一方面,实也有借此引领中国传播研究,使之向更高水平进展之意。当然,这16个字仅是入选文丛的最低门槛,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入选著作需有自己的创见,选题具有重要价值,质量超出平均水准。如果是博士论文,其总体水平必须要高于一般的学位论文。

文丛冠以“传播与中国”之大名,主要强调本土之意,并非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唯一研究单位,倒是希望有不同的研究层面。此外,众所周知,我们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已经举办近十年,丛书这样命名也是想与之有相承和呼应。总体而言,起名“传播与中国”是为了突出尽可能大的开放和包容度:没有研究对象的界限,也不论方法路径的差异;题材主题不限,关键是问题真、立意新、有见地;可以是专著,也不排除部分探索开辟新领域新路径的论文集。一句话,一切以质量为上,只要符合要求,尽可兼收并蓄。评审从严不从宽,宁缺毋滥,每年出版2~3种,持续几年,以能呈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最新面貌和最高水平。

一个学科的活力,有赖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必然以高质量的成果为标志。“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一定为此而努力,哪怕只是推进了一小步。这套文丛是我们所为,体现了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共识;但它面向全国,是广结良缘的桥梁。我们非常希望借助文丛,使这样的理念得到广大同道的支持、认可乃至推行和落实。因此,如果诸位同道关注文丛、重视文丛,而且乐意为文丛送上或推荐佳作,我们将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编委会

## 守 望

——《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序

郭建斌教授嘱我为他的新著写序。读完他的书稿之后，“守望”二字跃然而出，串联起感受和思绪的碎片，遂以此为题，写下几行文字。

我自知学养不足，写序是勉为其难。但我跟建斌相识、相交近20年，其间以诚相待，有文字交往，也有同席共饮，学术上亦时有共勉。要说起来，他首次阐释和运用“在场”的文字，还跟我有点儿脱不掉的干系：他2008年的那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发表于我客座主编的《传播与社会学刊》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专刊上。不仅如此，在本书报告的这个项目展开期间，我也曾几次饶有兴趣地听他讲田野考察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其中包括了我們于2014年冬在合肥的相聚和讨论。正是在那次的讨论中，他首先谈起准备以“国家在场”“转场”和“观影者在场”这三大块来组织书稿。有此背景，我想如果写下我的一些所观、所感，或可作为一个“伴随文本”，记载我与建斌所体验的学术氛围，以衬托他这本专著的成就和局限。

我已不记得何时、何地与建斌初次相见，但记得18年前一个台风季节在香港的相见。当时，建斌、吴飞等几位朋友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说要来香港中文大学找我，得到电话后，我就在办公室静候。谁知他们在路上突遇暴雨，从大学火车站下车后，冒雨登山，抵达我在新亚书院的办公室时，每个人都被淋得精湿，在办公室站立一会儿，每人脚下积出一汪水。但是，大家都兴致不减，在我的办公室畅谈，其间他们轮换着去卫生间用干手器烘干衣裤。我已记不清具



体谈了什么，但可以肯定未出学术的范畴。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从我的书架上搜罗了一堆书，装满了—个手提拉杆箱，说要到深圳找一个朋友扫描，然后再归还。那时，国内的学术信息远不如现在这样充实，学术资料也远不及现在这么丰富，很多人不得不如此以体力劳动来搜集学术文献。这样的“书呆子”和“学痴”言行，奠定了我们此后交往的基调。

几年后的2007年夏，我受邀到昆明，参加由云南大学新闻系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暑期研习班，主题是“民族志与传播研究”。记得在这次研习班，我讲了三场，分别涉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阐释”，麦克阿隆(John MacAloon)的“文化表演理论”(建斌在书中更恰当地译作“文化展演”)，布尔迪厄和福柯涉及“空间”的一些论述，其中包括被福柯称为“别样的空间”的 heterotopias(在场的黄顺铭告诉我，国内译作“异托邦”)，以及我自己受这些理论启发而展开的一些经验研究，包括对央视“春晚”、我国媒体对“香港回归”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都市影院改造的考察。其中关于格尔兹的讲解，由建斌组织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再经我修订后，以“作为‘深描’的民族志”为题，刊载于建斌主编的论文集《文化适应与传播》。

其实，我曾多次说过，我自己属于民族志的“业余爱好者”。在跟建斌交往前，我回到国内，想做点儿于我人生有意义的研究，而对当时国内激荡的变革，我首先获得的是在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维度上的感受，觉得难以施用自己所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于是开始进一步研读英国文化研究、法国社会学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文献，从中寻求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因此在民族志这个方向，我的阅读是不系统的，训练是在实用中获取的。与建斌及其他国内学者的交往，令我获得了一个支持我学术追求的群体，在其中获得了学术取向层面的归属；2007年的那个暑期班，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小结的机会，更开阔了从建斌等国内学者那里获取的学术交流。

与我这游牧式的学术行走不同，建斌一直坚守着他选择的学术方向。就文化地域而言，他始终聚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独龙族聚居的“独乡”到滇川藏“大三角”地区；就研究取向而言，他始终坚持将围绕媒体而展开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如电视进入“独乡”和乡民们收看电视的活动，电影放映体制在“大三角”地区的铺设以及构成“流动电影”的电影放映和收看活动等)，置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作为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构成来考察；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始终坚持经验的路径，进入田野，融入所试图理解的社会及其生活，并尽力客体化地反思这个探寻的路径，以及自己在其中所作的方法的选择。这些特征，我们在建

斌的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我曾感叹，从事经验研究，须得采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态势；这就是说，在知识论维度上要坚持尊重实在的经验，在考察现象的过程中要平心静气、持之以恒。建斌是我国传播学界为数极少的这么去做并且做出可圈可点成就的传播学者之一。我们从他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并感受到这一点。在各地、各学科的学者们被工具主义的评估体系催逼着走短平快路线的年代，这样的坚持精神，格外难能可贵。

而且，建斌这么多年来，并非在独自坚守，而是与同事、同道和学生们组成了一个风格清晰的学群。这本书所报告的，是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得以展开，我知道，离不开由黄旦老师及其领衔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支持。我更希望指出，围绕这个项目的实施，建斌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团队；在从2009年立项到2015年这6年的田野考察过程中，这个团队的很多成员，如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他们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学者在这个项目中的贡献，建斌在书中都有展示。由于他们的努力，当远眺西南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空气浓郁的“学群”，其中的学者们风格独特，都以平视、凝聚的目光，置身“彼处”(Being There)，考察边陲、边缘的少数民族及其生活；他们视野开阔，都在阅读、探究并运用中西方的文化与社会理论，回身“此地”(Being Here)，解读自己的田野考察，建构出引人入胜的学术叙事。<sup>①</sup> 他们的学术实践，不仅增添了我们的知识、丰富了我们反观自身所必需的思想资源，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个案，描绘了五彩斑斓的文化图景。这个学群的活跃和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构成，也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着，在这个商业逻辑肆虐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守望学术的理念和热情。

建斌的这本书虽然只是对一个西南地区“流动电影”的考察，但是视野却极为开阔。首先，就地域而言，这个地区跨越滇、川、藏三个省(自治区)，覆盖了三个地级州市，其中两个以藏族为主，另外一个有多民族的居民。其次，就时间跨度而言，这本书以“当代”涵盖了1949年以后的60余年；就“流动电影”而言，这个时期至少可被区分为体制创立和巩固、改革开放中的凋敝、20世纪末以来的重构这么三段。第三，就分析对象的构成而言，建斌告诉我们，这个项目考察的“流动电影”包括了流动于乡村的电影放映队，他们的组建和活动，也包括了所

<sup>①</sup> 此处沿用的概念，见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88.



放映的影片，它们的内容、制作、发行和给乡村放映员的派发，还包括了语言、习俗和生活形态各异的乡民们观看电影，以及观看活动所展开的时空点及其特征。综合起来，他在这本书中考察的是“流动电影”这一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探究它的展开如何呈现了国家的体制架构与多样的日常生活之间“奇异的宏观—微观关系”。<sup>①</sup> 第四，就解读和分析而言，建斌在这本书中以“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为理论解读和分析的开口，以为纳入由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的材料所构成的分析对象。

因此，就方法而言，建斌这本书所汇聚和分析的经验材料包括了历史资料（如地方志），深度访谈的记录，个人经历的口述史，进入田野的现场观察和与当地人的互动的记录等，建斌把这些搜集资料的手段都整合在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类别之下。他对方法的这个自我标识，也携带着他在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和反思，并且将之体现在了本书的结构和叙事形态当中：在引言和结语之外，他对章节的结构不求整齐划一，而是将对宏观结构与建制的勾勒和对鲜活个案的描述穿插展开，以描述和叙述为主，沿途用理论思考予以黏合、串联。因此，这“国家在场”“转场”“观影者在场”三部分的划分，为本书搭建了整体架构。

因为开口大，所以建斌引入的理论文献除了前面提到的格尔兹、麦克阿隆外，还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特纳的“仪式和社会戏剧”理论，柯林斯关于互动仪式的论述，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戴扬和卡茨关于“媒介事件”的阐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受其启发的“新受众研究”中关于受众的主动解读甚或再创作的论述，还有菲什（Stanley Fish）关于“诠释社群”的论述和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关于“媒介空间”的讨论等等，它们共同为建斌提供了论述和阐释“在场”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建斌采纳的是一个“整体性的”（holistic）论述路径，他自己称之为“总体性”的路径，并借用丹·席勒的话，将之进一步表述为“将‘传播’导入‘社会’的路径”，以“考察流动电影与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或者说是，流动电影放映、观影与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但是，这些来自不同领域、针对不同研究问题的理论未必可以轻松搭配，浑然一体。也许建斌还可用更日常、更直观描述的语言来展开“在场”这个核心概念，并且针对精准陈述的不同研究问题，将它跟“展演”“仪式”“媒介空间”“转场”等概念串联起来，形成层次分明的论述。比如，我们是否可以从提出并回答

<sup>①</sup> 这是建斌在这本书中引用郭于华教授的表述。

“什么是‘场’”和“什么的‘场’”入手呢？我的理解是，建斌此处的“场”，指的当是日常活动展开的场所(locale)，每一个具体的场所都有其特定“正当的”行动者，他们遵循具体的规则而互动；“在场”(presence, 也许, 可用 being present 来凸显动态的过程, 一获得更大的理论阐发和经验解读的空间)即是在此时此地, 遵循这些规则而与其他同在者们展开互动的过程和状态。按吉登斯的论述, 这样的“在场”激活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境(setting), 构成交往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更进一步, 不仅每一场所有其内部的区域(比如前、后台)划分, 而且不同场所相互之间形成特定的时空组合(the time-space organization of locales), 既受制于也构成特定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就建斌所考察的现象而言, 我理解其问题的核心是, “流动电影”如何作为手段或者行动的领域, 提升或扩大了一个场所的所谓“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 即: 并非身体在场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其他行动主体, 如何通过电影放映队及其活动以及影片的放映一观看, 实现了实体和象征的在场? 或者说, “流动电影”如何构成了特定形态的“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 即通过不同方式的时空组合而连接在场与缺席?<sup>①</sup>

吉登斯的这些理论语汇很抽象, 但也因此很有容纳力和逻辑的启迪。如此形成的问题表述, 在逻辑抽象程度稍低的层次, 可能形成相对更具体的问题。比如, 乡村电影放映体系的组织建设如何体现了权力主体对国家(包括了文化和政治)的空间想象? 乡村电影放映有何仪式, 如何通过这仪式性的互动而展开, 并在不同地方复制或变异? 乡村电影放映队的流动如何编织了不同场所之间相互的连接, 以及它们与国家体系之间的连接? 不同类型影片(如《农奴》、科教片、革命战争故事片等)的叙事, 如何在放映和观看的过程中形成了在场与缺席、实体空间和媒介空间之间的不同交互(intersections)? 在这样的交互空间, 人们如何感受到并表达出民族认同和政治身份? 提出和解答这类问题, 得益于所引用的其他学者的理论资源, 或可区分出不同的维度和分析层次, 相互映照地展开从而呈现“在场”的实体过程和状态。

不可忽略的是, 建斌同时也考察了放映员、观影的乡民等作为主体的言行, 也即是他们作为“诠释群体”的“在场”。以此为视角展开的分析, 突破了“政治身份的给予和询唤”这一单向的解读, 凸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诉求及其力量, 体

<sup>①</sup> 此处采用了吉登斯的语汇和论述逻辑。见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现了在“流动电影”这个国家权力实施的过程中，依然有所谓“文化的世俗化”。<sup>①</sup>也就是说，其一，“电影”这个现代性的媒介，介入这些主体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形成他们生活中特定形态的现代与前现代交织的界面；其二，这些行动主体通过谋生、娱乐和具体情境中的解读，消解流动电影这个国家行为中的部分刚性力量。

我没有跟建斌去“大三角”，因此缺乏唯有“在场”才会生发的感受和判断。提出这些来自“客位”(etic)的点滴想法，只在表达这么一个希望，即从建斌的写作中更多地得到一些“身在此地”的启迪。

再次阅读建斌的书稿，不但从中获得了很多鲜活的图像、人物、故事和表述，而且还唤起在皖南乡间观影的儿时记忆，挖掘出其中印证建斌所讨论的“国家在场”“政治身份询唤”“跑片转场子”<sup>②</sup>的画面和情节。我最早的大众媒介接触，就是在公社小学的操场上看电影。记忆中，每次流动放映队进村，都搅起节庆的气氛，孩子们个个兴奋难抑；夜间，十数里外邻村的居民，打着火把在山间蜿蜒而行，赶来看电影。除了节庆的记忆，还有对一些电影(如《小兵张嘎》《夺印》)的画面和故事的记忆，革命话语也因此是我成长过程中记忆重构的基本素材之一。建斌的文字，唤醒了我记忆中的这些带着激情和怀旧色彩的片段，更令我想起格尔兹在他《深描：一个文化的阐释理论》一文中的结束语：<sup>③</sup>

“阐释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探询我们自身最深层的问题，而是呈现他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那些在其他山谷守护着其他羊群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将之容纳于人类表达的可咨询的记载之中。”

由此，我想说，建斌这本书所体现的守望，不仅包括了他和同道们对学术理念坚持不懈的守望，也包括了对所研究的族群及其成员们建造和享有美好安康生活的守望，还包括了通过自己在“彼处”和“此地”之间的循环往来而丰富人类

---

① 我套用了卡茨和格维奇“休闲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of leisure)的概念。见 Elihu Katz & Michael Gurevitch, *The secularization of leisur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Isra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那时，一部电影的胶片分为好几盘，第一盘开始放了，第二盘可能刚在邻村放完，正被人骑车送来；如果没衔接上，大家就在场子里等着，当放映机重新转动的声音响起时，满场会一齐欢呼，电影又继续。

③ 我知道，格尔兹的论文集，*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已有不止一个中文版，但因为我的手头没有，只好采用了自己的译文。

的表达、拓宽自身的视野这一人文精神的守望。我衷心赞赏和敬佩他的这份守望。

最后，我祝贺建斌新著面世，并祝愿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热情不减，稳步前行。

潘忠党

2019年1月7日麦屯家中

## 前 言

本书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自2010年以来,在位于中国西南的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以流动电影及相关“媒介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由作者独立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

全书围绕“在场”概念,从国家“在场”、观影者“在场”及“转场”三个维度来展开分析,进而对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是对研究区域的背景及研究方法的介绍及讨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围绕“国家‘在场’”来展开;第六章至第十章讲的是流动电影方面的情况,即“转场”;第十一章至十五章围绕“观影者‘在场’”来展开。本书原来还有几个附录,后因字数原因,只能割爱。

本书从田野调查到最后成书,前后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出于学术规范考虑,我在这里无法列出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放映员以及基层管理者的名字,有些我使用了代码,但是他们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我一直铭记在心。

感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9年让我这样一个“校外”的驻所研究员申报“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并且不限选题,让我自由选择。

从2010年开始的田野调查,首先得到了云南大学新闻系(现新闻学院)同事和学生的大力支持,陈静静和曹云雯、孙信茹和杨星星分别承担了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调查，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刘展则和我一起去了西藏昌都。2010年第一次西藏昌都的调查，是西藏民族大学周德仓教授帮我牵的线。2011年7月至8月，原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同事陈宇和李元昭及学生刘展参与了昌都调查，芒康县帮达乡放映员、左贡县美玉乡放映员、八宿县邦达镇放映员、洛隆县电影站站长、边坝县电影站站长和放映员BQ、边坝县边坝镇放映员、丁青县电影站站长、丁青县觉恩乡放映员CP、江达县电影站站长、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电影站站长等均全力协助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昌都八宿县邦达镇放映员ZB，不但协助我们调查，此后还收留了学生刘展，让他住在家里半个月做他的硕士论文调查。

2012年7月至8月，原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罗宏生、张静红、张翎和当时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杭树志参与了昌都调查；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的王林社长帮忙联系了中新社西藏分社的徐长安社长，徐社长又帮我们联系在拉萨的访谈；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梁小平书记、原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经理帕巴群增接受了我们的访谈；从拉萨沿317国道到昌都丁青县的途中，在那曲地区巴青县雅安镇遇到了热情的云南老乡YH夫妇；丁青县觉恩乡放映员CP带我们到夏季牧场上去放电影，在牧场上住了三天，AD家给我们搭了帐篷，并负责我们的生活，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在那里我们也结交了几个朋友；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土呷接受了我的访谈，并赠送我一本他的专著——《西藏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江达县电影站站长再次接待我们，并且带我们到车所乡、同普乡、岗托镇放电影，一直把我们送到金沙江东岸的德格县。2012年底，我在复旦读博士期间的同学王惠帮忙联系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毛羽副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访谈。

2014年6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倡议，在昆明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围绕我当时完成的初稿进行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殷晓蓉教授、廖圣清教授，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以及当时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多位老师均参与了讨论。这次研讨会给我的书稿写作、修改提出了极有启发的建议，原来这些内容我都写在本书的导论中，后因书稿字数太多，不得不删除。2014年8月，我到四川成都、甘孜州康定等地进行调查，四川大学黄顺铭教授热情款待，西南交大的刘广宇教授帮忙联系了四川省广电局电影处，处长接受了我的访谈；甘孜州广电局电影科的副科长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2015年7月至8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同事方鑫及硕士研究生念鹏帆和我再度到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四川甘孜进行调查；当时云南大学在读的硕



士研究生丁争此姆的全家对我们关心备至,安排我们住到了他们在德钦县佛山乡江坡村的家里,并协助我们完成了在江坡的调查;在昌都丁青县,我们再度见到了觉恩乡放映员 CP,他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了 2012 年去过的夏季牧场,同样是 AD 家负责我们的生活;在四川德格县,电影站站长不但协助了我们在德格县城周边的调查,还把我们介绍到了德格县年古乡;年古乡乡长把我们带到乡里,给我们安排了在年古期间的所有食宿,还亲自驾车到 150 多公里之外的甘孜县城帮我们请了修车的师傅;年古乡政府的 LSL 全程陪同我们在年古乡开展调研工作。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也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上,让我有机会报告和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与学界同人进行交流。这些学术活动分别是:2010 年 10 月在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2010 年 12 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中国传播学会 2010 年年会,2011 年 7 月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华传播学会 2011 年年会,2011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六届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2013 年 6 月由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西南人类学论坛”,2015 年 3 月在浙江缙云举办的“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学术周,2015 年 11 月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 2015 年年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6 年 7 月在贵州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七屆全球传播论坛(上海交通大学等主办),2017 年 1 月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大中华访问学者研讨会”,2018 年 5 月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第八屆全球传播论坛暨国际传播学会(ICA)2018 年度大会专题论坛(上海交通大学承办)。

本课题于 2016 年底顺利结项,结项等级为优秀。虽然我至今不知道具体是哪些评审专家,但是这样的评审结果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2017 年初书稿基本完成时,我向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主编的“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提出申请,希望拙作能够进入该文丛。书稿评审人潘忠党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均给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潘忠党教授,认真审读了近 40 万字的书稿,在肯定的同时给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建议。从 2000 年到复旦读博士认识潘忠党教授,无论是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几篇论文,均得到了潘忠党教授无私的指导。2008 年第一次提出“在场”概念的那篇文章,也凝聚着潘忠党教授的心血。2007 年 8 月至 12 月,潘忠党教授接受我到他所在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访学。2010 年出版的《边缘的游弋》一书,书名也是潘忠党教授帮我提炼出来的。本书出版之前,潘